

教育生涯漫談 (一)

劉季洪

我近因所任職務任期屆滿，得獲退休。老友朱建民先生主持商務印書館業務，謂東方雜誌擬對生平體驗，訪問紀錄。自念個人自幼就讀私塾，以後升學皆為師範學校，留學期間亦主修教育。因而離校開始就業直至古稀之年，始終未離教育工作範圍，聊充薪火相傳的一員。不久以前，曾於暇時將舊時求學任教情形略作記述，惟因個人一生平庸，所記既無系統，又極簡陋，未敢發表。現建民先生有此盛意，特將前稿送請指正，藉以充數，或可免除口述記錄之勞。至於所記內容，由於個人過去長期生活在求學與任教之中，因而文中所提大都屬於舊時所接觸的教育有關問題。此外，個人雖於早年廝身學府，晚歲參與考政，得有機會常與當代賢達交往，睹其風範，聆其學養，獲益良多，但在記述中絕少提及，因覺個人回憶記事，不應涉及他人。至晚年又奉派參加考試院工作，則院中文獻有施政編年錄，記載頗詳。個人在院雖達十一年之久，但貢獻不多，且亦事涉政府行政，就不再作任何記述了。

壹、幼年時期的新舊教育

我於民前八年，生於江蘇省的徐州豐縣。在上古時代，徐州原為禹貢九州之一。秦朝統一天下，廢封建設郡縣，豐縣當時為豐邑，屬於泗水郡的沛縣。在這時期，生在豐邑的劉邦，率豐沛子弟起兵滅秦，以平民而為天子，把沛縣改為沛郡，豐邑改為豐縣。所以我們在外提到籍貫，就會引起人們對這過去人傑地靈輝煌歷史的回憶。在漢朝時代，因為是湯沐邑，得到減輕賦徭的優待，當時縣民的生活自然要好一些。此後每逢戰亂，因地當交通要道，常受兵災。到了明朝弘治六年（一四九三），黃河在河南改道，由鄭州、開封、商邱到達蘇境，經徐州東流入海，在明清兩朝為我豐縣帶來很大的災害。因為黃河常常決口，不但平時沿河各縣要為堤防征

工征料，而且每次決口，豐縣輒首當其衝。明嘉靖五年（一五二六）一次的決口，竟把我縣城完全淹沒，縣治遷往城南華山，三十年後才又在縣城原址重建，但範圍僅有舊城三分之一，這就是我們後來的縣城。城的四門重新命名，很能表現地方的特性：東名「望華」，是指遙望縣境僅有的城東華山；南名「中陽」，是因城南中陽里為劉邦出生地；西名「障瀾」，表示黃河水患常由西方而來希望能阻障狂瀾；北名「大澤」，乃因城北地勢低窪，積水多時舟楫可通東北南陽、微山諸湖。最後到咸豐六年（一八五六）黃河又在河南銅瓦廂決口，改道山東入海，對於豐縣的水患災害才算消除。

從山西移民豐縣

過去黃河水患對於我們家鄉影響之大，拿一件事可以看出：我們全縣的人談到祖先上代，很多說是在明朝從山西洪洞縣移來的。我想這是由於明朝有幾次黃河決口，豐縣受害最大，決口修復，動需數年，在此洪泛期間，縣中居民死亡流離，原野爲空，等到水去之後，人口稀少，就要從外方移民，山西洪洞縣可能是明朝某一時期移民的總站。我年幼時曾聽祖母說，咸豐元年（一八五一）黃河在碭山蟠龍集決口，洪水經豐縣西南境向東北滾滾奔騰，外祖母家在城東南李川樓，她登樓親眼看到狂流所到之處，村庄一陣塵烟高起，房屋立刻化爲烏有。外祖母家有一高樓，雖當慢流區域，但水退後，樓下一層已全部淤沒泥土之中，我幼時常常看到。由此可見每次黃患之後，災情重大，地方人口必然減少，我們上代大概有不少人就是由於這種原因，在明朝一次大移民從山西遷來。

現在再略說我自家的情形。我們的家譜上溯只到明朝，上面寫明上代是從山西移來，更可證明以上的說法是可靠的。我家移來以後，先住城西南二十里劉堤灣，後來擴展到劉庄等村莊。清嘉慶元年（一七九六）黃河在碭山龐家林決口，洪水經豐縣西南境流向東北，劉堤灣一帶遭受嚴重水災，我的高祖就南遷到劉王樓（當時爲王樓，後因劉姓人多，故改稱）。我的曾祖克勤公對於田產庭院頗有經營，祖父溪山公兄弟九人，分別耕讀。咸豐年間太平天國和捻匪之亂，多次進擾豐縣，兩次攻破縣城，我家也受到很大破壞，四伯祖父並且爲捻匪所殺。我祖父行九，早年進學補廩，終身以讀書自娛。我的父親峻川公兄弟三人，十六歲與伯父同爲秀才，後亦補廩（豐縣廩生名額共二十人）。當時因津浦、隴海鐵路尚未修築，交通困難，到省城南京須經徐州、清江浦沿運河舟行，至瓜州再溯江而上，途中需十餘日，故未曾參加鄉試。我兄弟四人，長兄名鼎，字伯寶，次兄名彝，字仲華，三兄名銘，字叔箴，我本名鐘，字季洪，後出外讀書，遂以字行。我的父親四十二歲去世，當時我才兩歲，母親含辛茹苦，撫養諸孤，對兒輩教育特別重視。我長兄因出嗣八房，另立門戶。二兄於民前四年至南京讀書，因交通關係，甚少回家。我六歲以後先隨三兄入私塾就讀。不久武昌起義，民國建立，縣中於民國元年成立新式小學，就轉學到縣城入學，數月後再回家重入私塾。民國四年，爲了取得學校文憑以便出外

升學，又到縣中高低插班入三年級（當時學制高小三年），四個月後畢業，我就成爲本縣高小第一屆的畢業生。現在回想幼年在所受私塾和新式學校兩種教育，內容和現時都大不相同，所以想把個人對這過渡時期新舊教育的體驗加以追述。但又由於本身實際體驗有限，因而就又把清末民初舊式教育概況以及新式教育開始發展的大致情形，先作說明。

我國舊式教育

談起我國舊式教育，歷史極爲悠久。上古三代學設於官，政教並行；及至東周官學漸廢，私學興起。隋唐之後，改用科舉取士，對於民間教育並不直接辦理，人民爲求取得功名，就要自設學館，教育子弟，以便應試。所以在敘述舊教育時又不得不先談到科舉制度。清代的科舉大體仿效明制，考試分爲三級：

一爲童試。清代地方行政單位有省、道、府或州及縣四級，考試先在府州縣舉行，普通稱爲童試。這種考試要考三次；第一次爲縣試，參加的考生稱爲童生，由知縣主持；第二次爲府試，參加的考生是縣試及格者，由知府主持；第三次爲院試，參加的考生是府試及格者，由各省學院或稱學政到各府主持。院試及格者稱爲秀才，可入縣學進修。

二爲鄉試，是在各省貢院舉行。各省學政在每屆鄉試前，先到府州對準備參加鄉試的生員舉行一次科試，錄取以後方准參加鄉試。鄉試及格稱爲舉人，可任普通文官。

三爲會試及殿試，是在京師舉行。參加會試的考生是各省的舉人，由皇帝特派大總裁主持。會試及格再由皇帝親策於庭，稱爲殿試。殿試在定次第，分爲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爲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以上人員可任較高級文官。

清代科舉制度除各級考試外，同時還設有官學，但參加學員僅限於考試及格具有功名的人員，其主要目的在於定期檢查他們平日自修情形，並不是一般大眾的教育機構。清代的官學大體亦沿明制，地方有府州縣學，京師有國子監。

設在地方的學校，府有府學，州有州學，縣有縣學，通稱儒學，入學生員限於新進的秀才。教官在府為教授，州為學正，縣為教諭，並另設訓導為之佐理。學員平時並不留堂肄業，僅有月課、季考及歲考。月課季考由教官主持，月課集諸生於孔廟明倫堂，誦聖諭廣訓等；季考除四書文外兼試策論。歲考由學政按臨主持。清代中葉以後教官月課季考多不舉行，生員考核全賴學政按臨主持的歲考。生員在學名義有附生、增生、廩生三種。歲考及格後，可由附生補增生，增生補廩生；不及格者，廩生降增生，增生降附生，附生革除功名。

國子監設於京師，入學限於舉人及特許的貢生監生。教官設祭酒及司業總理監務，監丞掌管學規，博士、助教、學正及學錄為各級教員，典籍掌管圖書，典籍掌管文牘。清代國子監准監生在寓所或在原籍肄業，實際留監學員不多。光緒年間王先謙曾為國子監祭酒，欲加整頓，但苦無經費，特以私人關係向同鄉左宗棠求助。在其致「左侯相書」中，敘述當時國子監住學津貼為數甚少，且空名冒領者幾十之九，所以他雖加整頓，最初住學的也僅四十餘人。由此可見稱為太學的國子監，實際也是近於虛設。

此外，中央另有翰林院，進士方能選入，或為皇帝文學侍從，或留院讀書，為國家儲才之所。省及府縣則另有書院，多為官立，亦有私人創設。清初在順治年間曾禁設書院，以免講學喚起漢人民族精神，但自中葉以後又准設立。官立書院除秀才外，童生亦可參加，各縣書院通常僅每月舉行考課，優者分給獎金。但亦有重要地區如省垣或府城官設及少數私人所設書院，遇有名儒主持，多認真講學授課，學員留院就讀，成為真正傳道授業的學府。例如我們徐州府城光緒年間的雲龍書院，由徐樹錚將軍尊人忠清先生主持，由於他是有名學者，並熱心傳授，就培育了不少人才。民初參加段祺瑞幕府的銅山張伯英先生，是著名的文學家和書家，以及徐將軍本人，都是當時雲龍書院的學員。

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清時舊式官學，乃為配合科舉而設，以考察督導具有功名人員的學業為主要目的。至於民間一般大眾的教育，則全賴私人設置的學館或私塾。學館有的是由教師自設，收容鄰近學童；有的是由學東延聘西席，專教家中子弟，有時亦准少數其他學童附讀。在學館讀書有

的是為略識文字，以供日常應用；有的是研習文藝，志在科舉。所用教材開始多為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以後就各人個別情形，加讀四書五經以及文選綱鑑等。

我國科學掄才，本來具有很多優點，不但可使全國人民能有平等機會參加國家政治，同時政府藉此也能選拔優秀人才擔任公職，所以近代歐美國家也多採行，以建立文官制度。但是由於歷代科舉在考試方法上陳陳相因，不求改進，以致制度優點為之湮沒。先就試題而言，清代沿襲明舊，專以四書五經為範圍，因而學術思想難有創新。再就文體而言，清代亦沿明制，限用八股格式，內分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必須依式寫作，並限字數約在五百至七百之間。這種限制似專為閱卷方便而設，但使考生窮年累月，在作文格式及構句上苦心揣摩，消耗精力於無用之地。所以有人認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坑儒。」到了清末，國勢日衰，列強欺凌，於是不得不改弦更張，以求自救。先於光緒十三年改革考試內容，增考數理及各國史事，又於二十四年增辦經濟特科，但仍無實效。最後於光緒三十四年就被迫把歷時千餘年的科舉制度澈底加以廢止了。

清末推行新學制

廢科舉、興學校，是清代末葉維新自強運動的主要課題，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才得到成功。科舉廢除以後，同時新學制也開始全面推行。但在以前，部份政府官員及教會與私人早經試辦新型學校，以應各種不同需要。

在同治光緒年間正式新學制建立前，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員創辦的新型學校可分四類：一為培養翻譯人才的學堂，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湖北方言學堂等。二為培養工礦人才的學堂，如福建造船學堂、上海機械學堂、天津電報學堂、上海電報學堂、湖北礦業學堂等。三為培養軍備人才的學堂，如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湖北武備學堂等。四為實施普通教育的學堂，如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長沙時務學堂、京師五城中小學堂等。

在此或較前期間，教會也設立不少新型的書院，如上海約翰書院（後改爲聖約翰大學）；武昌文華書院（後改文華大學再合併武昌博文書院及漢口博學書院而爲武昌華中大學）、南京滙文書院（後改金陵大學）、上海及蘇州中西書院（後合併爲東吳大學）、上海震旦書院（後改震旦大學）、廣州格致書院（後改嶺南大學）、北平滙文書院、通縣潞河書院（後合併爲燕京大學）等。

至於私人在同時創辦的新式學堂似乎更多，據梁啟超變法通論的幼學篇所說：「今沿江沿海各省，其標名中西學館、英文書塾以教授者，多至不可勝數。」其中著名的有光緒二十一年鍾天緯所辦上海三等學堂，自編語體文爲教本；光緒二十四年俞復所辦無錫三等公學堂，自編蒙學讀本；光緒二十五年陸基所辦蘇州崇蒙學，自編啓蒙圖說及啓蒙問答爲教本。當時所稱蒙學及三等學堂，爲以後的小學，二等學堂爲中學，頭等學堂則爲專門學校。

以上所舉各類學堂的創辦，既無全盤計劃，制度亦不統一，所以對全國教育來說，僅有啓蒙提倡的作用。光緒二十四年清廷開始全面推行新政，決定興學，首先制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除本身爲一最高學府外，同時也是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統轄各省各級學堂。但因隨即發生戊戌政變，慈禧依舊掌權，新政受挫，京師大學堂籌備工作陷於停頓，直至光緒二十八年，僅有仕學館及師範館短期招收少數學生。對於各省興學，更未着手推動。不久又有庚子之亂，清廷再遭重大挫敗，慈禧不得不順從輿情，勉行新政，乃於光緒二十八年頒佈欽定學堂章程，詳訂各級學校體制，準備全面實施。但因當時朝中意見分歧，此一學制尙未實行，又於次年另頒奏定學堂章程，將各級學校類別及修業年限加以修正。光緒三十一年又在中央成立學部，爲獨立的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從此以後，新式教育方在全國開始積極推展。

奏定學堂章程所訂學校系統爲：初級小學堂五年，高等小學堂四年，中學堂五年，高等學堂三年，大學三年至四年，通儒院五年。此外旁枝另有師範學堂及實業學堂等。依此學制，自小學至大學畢業，至少需時二十年，再加通儒院，則達二十五年，這是我國近代興學以來修業年限最長的

學校系統。實施以後，全國各省熱心推行，自光緒二十九年開始，至宣統元年雖僅五年，據學部統計，全國各級學校已達五萬二千三百四十八所，其中官立一萬四千三百零一所，公立三萬二千二百五十四所，私立五千七百九十三所。所謂公立，乃爲地方民衆或團體合力所設置。

清政府學部及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平的檔案，於民國十七年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接收，運往南京，大陸淪陷時又運來台北。我在主持政治大學期間，曾商請教育部准將可以公開的舊檔案，由政大照相製成微捲，現存圖書館，隨時供人閱覽。從舊有的檔案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興學的詳細經過，也可尋出新舊教育觀念演變的情形。就光緒二十九年奏定學堂章程對於各級學堂課程的規定來說，最初對於讀經極爲重視。以後逐漸減少，到了民國元年乃至全部取消。以初等小學爲例：原訂科目表初小五年各年每週均爲修身二小時，讀經講經十二小時，中國文學四小時，算術六小時，歷史、地理、格致各一小時，體操三小時，共三十小時，圖畫、手工爲隨意科。及至宣統元年，改爲一、二年級不讀經，並將歷史、地理、格致併入國文科，增加國文時數爲一年級十八小時，二年級二十四小時，三、四、五年級爲十二小時。宣統二年又將初小修業年限縮短爲四年，讀經時數更爲減少。民國元年元旦臨時大總統就職後，教育部於一月十九日即先頒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其中有一條，就是「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

教科書的編印

關於編印新教科書發展的情形也值得一談。在清末我國尙未興學以前，基督教會已多附設學堂。光緒二年舉行傳教士大會，以學堂無通用教材，議決組織「學堂教科書委員會」，曾編有部分教科書。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奏設的南洋公學，先設師範院，考選優秀學員四十名；又設外院，招收聰穎幼童一百二十名，由師範生任教。師範生陳頌平及朱樹人分編蒙學讀本及高等蒙學讀本，供外院學童學習。這可能是我國最早自編的小學教科書。此外，以前曾提及鍾天緯、陸基、俞復等也分別在私人所辦學堂自編教科用書。俞復並於光緒二十八年在上海創設文明書局，用石印將自辦

無錫三等學堂所編課文印刷發行，當時正值各省開始大量興學，其課本竟風行全國。俞復於民國十六年後在江蘇教育經費管理處任職，我常參加該處會議，曾聽其述說當時文明書局課本發行盛況。

由於學校教科用書需要日增，繼文明書局之後，其他書局亦多出現，其中以商務印書館規模為最大。該館創設於光緒二十三年，先為印刷所，二十八年增設編譯所，並着手編印教科書。光緒三十年該館東方雜誌第一期會登有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首册出版廣告。我幼時在私塾曾讀此書，第一課為天地日月山水草木，並有彩圖。此書為蔣維喬等所編，生字選擇，字句構造，課文意義，字圖印刷，均多可取。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台見中國時報副刊，載有張良澤君所寫「民初最早的小學課本」一文，說他現存民國二年二月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初等小學最新國文教科書」第一册，版權頁載明：「甲辰年十二月初版，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八十八版」，並註明為「修正初等小學最新教科書」。張君並將六十課課文刊出，較我過去所讀課文為多，想係由於光緒二十九年規定初小一年級中國文學為每週四小時，至宣統元年減少讀經，改為國文每週十八小時，因而修正課本增加課文。但至民國元年初小一年級國文又改為每週十小時，課本須再修訂，張君所存民國二年出版的課本可能為第二次修正本。

六歲進入私塾

以上所談新舊教育過渡期間一般情形，似乎已經太多，現在要再回到本人的一點經歷了。我六歲進入私塾，是堂兄家所設的一個學館，學生七八人都是近房子弟。老師潘先生態度很嚴肅，講書不作詳解，學生也不敢多問。每天除讀書習字時間外，學生皆須高聲朗誦，以示勤奮，平時又無假日，所以當時讀書確是頗為辛苦。我先讀三字經、百家姓，接着再讀千字文。這幾種書並不易讀。三字經前半本課文如「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等，講了似乎還有點懂；到後面如「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等，對初學者就完全無法了解。百家姓和千字文既難認，更為難講，讀起來當然毫無興趣，所以我在私塾第一年，深以讀書為苦。所好不久買到一種字大圖多，印刷精美的新教科書，就是前面所說商務

印書館最早出版的國文教科書，課文不但易認，更容易懂。首册是供春季始業使用，課文很多配合時令，其中有一課是「四月天，大麥黃，南風入戶，單衣不冷。雨水足，田工忙，婦女採桑，兒童送飯。」又有一課是「五月大雨，田中水高，農人分秧，秧針出水，高二三寸。岸旁水車，上下往復，有三四人，在水車上，口唱田歌。」這類課文對農村兒童真是太切合了。所以換讀新教科書後，才引起了讀書的興趣。

民國元年縣中成立新式小學，設在孔廟，我同三兄也進城就讀。學校新成，一切尚無定規，學生志願來的皆可入學，年齡懸殊，程度不齊。全校學生約五六十人，齊集明倫堂上課，分為四個年級。除國文所用教材有深淺不同外，其餘各科如算術等皆從開始全班共同學習。年長學生多在十五六歲以上，經常打架生事，教師似亦不多約束。當時我最年幼，處此環境，難以適應，半年後又回家重入私塾。這次學館設在我家，學生除我與三兄外，另有族姪二人。老師孫炳章先生是我縣的一位廩生，善於教學，從民國二年到四年的二年半中，對我的啓發很大。孫老師到後，首先查明我們過去讀書情形，就決定要我同三兄試讀古文觀止，先選容易懂的如桃花源記、醉翁亭記、賣柑者言等短篇，詳加講解，意義了解以後，很快就能背誦。另外要我們學看綱鑑易知錄，在未開始閱讀以前，他先用講故事方法從盤古開天闢地說起，以後伏羲氏如何結繩製網，有巢氏如何教人架柵造屋，神農氏如何嘗百草，教人種五穀。這樣每天說一段，引導我們去看綱鑑記載的內容。他的教學方法注重理解，注重興趣，很合乎現代的教育原理。至於他先選擇這兩種書作為教材，後來我才知道是有所本的。古文觀止和綱鑑易知錄都是清初吳楚材所編。他因自幼兩足殘廢，一生就專心教書，從實際教學經驗中編成這兩部文史教材，以便初學。古文觀止選文上自周秦，下至明季，都是流暢易讀的文學作品。綱鑑易知錄係輯通鑑綱目等書而成，並自盤古氏敘起。很多歷史學家對上古傳說因無確實資料證明，多避而不談，但我國唐虞三代文化，決非憑空而來，採取部份合理傳說，反可增加人類歷史的完整性。所以綱鑑易知錄開端先有上古傳說的記載，是很合理的。吳氏這兩部書後來被廣泛採用，使很多初學的人得到益處。

我們當時每天除讀書外，並規定寫字作文。作文每日一篇，作完即改，幾個月後，頗有進步。此後陸續讀四書、左傳、史記精華、東萊博議等書，也選讀過詩經、書經的一小部份。讀四書先讀孟子，因其文辭流暢，而且比較易懂。至於左傳、史記都是敘述史實，因先讀綱鑑已引起讀史興趣，所以讀起來趣味格外濃厚。到民國四年，三兄到南京升學，我到縣中高小入學，我們的私塾生活就告結束。這兩年多對我的影響很大，首先引起我讀史興趣，多年來有暇經常以閱讀史籍傳記作為消遣，從歷史中鑑往觀今，增長了不少處事接物的認識，這不能不歸功於蒙師的啓發。

我第二次到縣城高小是插入三年級，時間只有四個月就畢業。在校期間對於國文以外學科需要多加補修，所以覺得十分匆忙，但能很快畢業取得升學資格，總算達到目的。

現在回想幼年在家庭讀書已經是七十年前的往事。私塾教育早已成為歷史陳跡，難以再見。但是落伍的私塾也有優點：一是個別教學，可以增加教育效果；二是注重文史，能多陶冶學生德性。這兩項優點正是現時學校教育的缺點。因為現行制度一方面小學均為班級教學，班級人數衆多，兒童個性常被忽視；另一方面現有課程偏重一般知識，文史重量減輕，人格發展缺少激勵。我想補救的方法，唯有求之家長本身，就是希望每位家長了解現行教育制度的缺陷，對兒女開始入學的幾個月中，每天回家要輔導復習，使其對於所學能澈底明瞭，發生學習興趣，以補班級教學之不足。以後逐年更要依照兒童了解能力，隨時選擇可以陶冶德性的課外讀物，使閱讀後能多知嘉言懿行，以激發其見賢思齊，引起景慕嚮往的心理。果能如此，兒童在幼年奠定良好根基，成長以後自然就少有問題了。

人人文庫二五一三一四

日本古典文學評介

余我 編著
定價 二七元

本書各篇，係評介日本有史以來到明治年間比較重要的古典名著，編者以客觀的態度，詳述各書要點、時代背景、作者思想，由此亦可瞭解中華文化對日本文學影響之深厚，全書文筆流暢，引證廣博，為有關日本古典名著最詳盡的書評著作。

人人文庫二四九五—六

文藝雜纂

張永明 著
定價 二七元

本書為作者平日研究文藝之心得，隨筆記錄輯編而成，內容包括文史掌故及前人軼事，有質疑、有論斷、有創見、有發明。取材廣泛精審，行文平易暢達，可供參考之資料尤多，愛好文藝讀者，人手一冊，必能有所助益。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